
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

——海外访史录

杨天石

1990年7月，我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，承图书馆吴文津馆长、善本室主任戴廉先生热情接待，惠允披阅该馆珍藏的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。这批函电分订数十巨册，或系原件，或系抄稿。不少函电字迹潦草，未署时间，或所署不完整，而且大量使用隐语、化名，例如四工、工、延、福、门、门神、蒋门神、阿门、容甫、水云、远、马、马鸣、衣、力、黄梅、秋梦、不、不孤、跛、跛哥、桂矮、矮仔、某兄、爵、马二先生、香山后人、渔洋后人、八字脚等。但是，一旦突破这些困难，人们就会从中发现大量30年代中国政坛内幕，特别是一个迄今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——胡汉民晚年，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，曾经广为联络，组织力量，一再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权。

笔者在哈佛访问时间仅两周，匆匆披阅，匆匆摘录，以下所述，系对这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的一点收获。

一 逼迫蒋介石下野

1931年初，因制订“训政时期约法”问题，胡汉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尖锐化。2月28日，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。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，时任立法院长。蒋介石的这一蛮横做法立即激起了巨大政潮。4月30日，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、林

森、萧佛成、古应芬等于广州联名通电，弹劾蒋介石，诘责其“违法叛党”，“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大员”。5月27日，汪精卫、孙科、邹鲁、陈济棠、邓泽如、萧佛成、古应芬、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，形成宁粤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。同年，九一八事变发生，东北大片国土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。蒋介石在举国震撼，呼吁团结对外声中，派蔡元培、张继、陈铭枢赴香港与汪精卫会谈，决定两个国民政府同时取消，召开和平会议，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。10月13日，蒋介石迫于粤方压力，释放胡汉民。

1927年蒋介石“清共”之后，胡蒋之间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。汤山被囚使胡汉民既愤怒又沉痛。释放后，胡即决意反蒋。他在一封密札中说：

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，能请西医者割去，是一治法，否则用中医拔毒（什么内托外消）、打消方剂，亦或见效。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。^①

这里的“门”，和其他密札中的“门神”、“蒋门神”，均指蒋介石，盖取《水浒》中“武松醉打蒋门神”之义。这封信道出了胡汉民对蒋介石的认识，也道出了他晚年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及其策略、手段。

10月14日，胡汉民抵达上海。15日，致电非常会议委员汪精卫、陈济棠、李宗仁等，认为外患急迫，为甲午战争以来所未有，其原因在于“党内纠纷迭乘，政治举措失当，人每欲扶党内之一部力量为己有”。他鼓励非常会议的委员们“彻底觉悟，力图团结”，改正过去种种错误。^②16日，对报界发表谈话，批评

① 《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》，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。本文凡未注明出处的未刊函札，均藏该馆，不一一注明。

② 《致粤非常会议各委员电》。

南京政府“以无办法、无责任、无抵抗之三无主义，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，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”。^①25日，又致函广东省市党部，认为国民党已到了非进行彻底改革不可的时候；不改革，不但无以对国民，而且等于自掘坟墓。函称：

自袁世凯以来，军阀不一，其始莫不骄横一时，而其罪恶既显，终莫不相继仆灭。历史可信，公理不诬。^②

胡汉民这里明骂袁世凯等，暗斥蒋介石。他要求粤省国民党人“不为利诱，不为威胁”，警惕“阴谋分拆手段”。上述电函及谈话表明，胡汉民甫经释出，立即高揭抗日旗帜，准备团结广东国民党人的力量，与蒋介石周旋。

九一八以后，冯玉祥忧心国事，派代表到上海与胡汉民接洽。10月27日，胡汉民复函冯玉祥，认为“辽吉事起，知非举国一致，无以御外侮”。当时，宁粤双方代表正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。胡汉民称：“结果如何，似难预料，惟默察形势，则暗礁孔多。”^③同月28日，古应芬逝世。30日，胡汉民致电在广州的妻兄陈融（协之），请其转告陈济棠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萧佛成诸人：

一、此间决坚持不挠，以继湘翁之志；二、无论如何，弟与汪决不入京；三、迫某辞职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，打破独裁。^④

湘翁，指古应芬，他是广东方面的反蒋中坚。某，指蒋介石。

① 《亡国之三无主义》，《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》。

② 《致粤省市党部函》。

③ 《致冯玉祥》。

④ 《致粤中央电》。

“弟与汪决不入京”云云，表明胡汉民正和汪精卫联盟，摆开和蒋决战的阵势，力图迫蒋辞职，并对国民党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。此电可以看作是粤方代表参加和平统一会议的斗争纲领。会上，粤方代表攻势激烈，以致宁方代表蔡元培等人不得不一再以私人资格表示：“蒋下野不成问题，要盼广东同志不要相迫太紧，不要给他面子太难过。”^①在党政改革案中，粤方代表提出军人不能担任政府主席，不得为五院院长，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职位等建议，显然都体现着胡汉民的意图，其矛头直指蒋介石。

宁粤和平统一会经过激烈争吵，确定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，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委员，进而谋求合作。在广州“四大”上，要求蒋介石下野仍然是重要议题。胡汉民除主张“精诚团结，共赴国难”外，又提出“推倒独裁，实行民主政治”的口号。12月5日，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由胡汉民领衔通电，催促蒋介石下野，解除兵权，否则，决不到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。

国难深重，加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的做法极为不得人心，各方吹起了强烈的反蒋风。在粤方的坚持下，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长、陆海空总司令等本兼各职，胡汉民的“迫某辞职”计划取得胜利。

二 广泛联络，组织反蒋力量

蒋介石下野后，国民党随即召开四届一中全会，通过中央政治制度改革案，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，孙科为行政院长，蒋介石、汪精卫、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。1932年1月1日，胡汉民等通电取消广州国民政府，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、西南政务委员会。自此，胡汉民即留居香港，成为西南方

^① 孙科：《广州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》，《中国国民党历史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》（下）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83页。

面的精神领袖。

孙科内阁虽然成立了，但这个内阁既无权，又无钱。1月2日，日军占领锦州，孙科无奈，电邀蒋介石重返南京，并于25日辞职，由蒋介石重掌大权。28日，汪精卫背弃了“决不入京”的诺言，应蒋介石之邀出任行政院长，从而形成蒋汪合作局面。

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的当夜，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闸北，十九路军在陈铭枢、蔡廷锴、蒋光鼐等指挥下，奋起抗战。30日，孙科密电胡汉民云：

宁方对十九路抗日事，最初主退缩，避免冲突。战事起后，则硬责将领，不得违背命令，擅起战端。嗣知军民一致，不可遏抑，乃表示抵抗，然仍令十九路将领只准抵抗，不必扩大云。预料日方援军日必到，如京方仍无澈底决心，十九路必为牺牲。闻日方计划摧毁长江一带军事势力，结果南京中央必然崩溃，届时南方若无相当组织，中国将成无政府之局，望公与粤中筹继续存亡，以维民族生机。^①

南京国民政府对淞沪抗战的爆发完全没有准备，缺乏坚决抗击侵略的决心和勇气，孙科对此有清晰的了解。他估计，南京政府将会崩溃，建议胡汉民在南方建立“相当组织”。但是，胡汉民却比较冷静，他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宣布迁都洛阳，准备抵抗，特别是对十九路军是否继续支援等情况尚不清楚，“我方如决裂过早，反使其有所藉口”，主张“暂时审察”。^②

尽管胡汉民一时还不准备在广州另立政府，但是，他却在广泛联络，组织力量，待机倒蒋。其联络重点，一是湖南与西南各省，一是华北，一是海外。

当时，湖南与西南各省分别为何键、刘文辉、刘湘、邓锡侯、王家烈、龙云等实力派所统治，矛盾重重，各自割据。胡汉民力图将他们统一起来，形成一支和南京政府抗衡的力量。2月2

^① <广州转来上海电>。

^② 展，<跋《广州转来上海电》>。

日，胡汉民致函何键，试探其态度。函称：

幸十九路军持正不屈，上海得不为辽沈之续，而政府当道未闻筹战守之策，遽以迁都洛阳闻。国难益迫，陆沉无日，丁兹时会，不识先生将何以教之？

十九路军由于得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有力支援，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3月初撤离上海。5月，中日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签字，胡汉民派杨芷泉携函西行，联络刘文辉、王家烈。函称：

今宁中当局所以谋分拆我西南者，其惟一方策在以西南制西南，弟则反之，以为惟有以西南结西南，始足以确实齐一西南各省之步骤，以自保此干净土，亦即为来日推进大局地。

在此前后，胡汉民又致函龙云称：

弟以为今后欲复兴革命，推展大局，首在党务之整理，次则为政治上之改革，而西南之精诚团结，力谋建设，尤为当务之急。

自1932年起，胡汉民还曾派出使者会见刘湘、邓锡侯、田颂尧等人，目的都在于调解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，结成西南反蒋联盟。

华北方面，胡汉民的主要联络对象是冯玉祥。1932年3月，冯玉祥得知南京政府正在上海与日本侵略者谈判，准备签定密约，非常悲愤，命部属张允荣密函胡汉民，告以北方情况，要求西南方面联络闽、赣、湘、鄂等省，合谋举兵。函称：

蒋氏谋粤之急，已自胡宗南等入浙可睹。惟奸慝毒计，对粤亦将对北，韩遂当其冲。向方亦心愤于沪败与东北之亡，颇思及时举义，因请焕公于适当时间入鲁主持北方局面。至将来与事诸军，宋、梁〔韩〕等部已有约定，他在尚在协商。设西南能呼应于闽、赣、

湘、鄂，因对日之失，动全国之听，蒋氏可倒也。①

韩，指韩复榘；向方，指宋哲元。中原大战后，冯玉祥隐居汾阳峪道河，北方反蒋势力暂时蛰伏。此际，由于不满南京政府对日妥协，又企图乘时发动。此函写于3月18日。24日，冯玉祥自徐州到达泰山，隐居普照寺。过去，人们只知道是为了养病、读书，“努力充实学问”。此函说明，冯玉祥此行是应宋哲元之请，目的在于准备北方起义。

对于冯玉祥的反蒋计划，胡汉民自然是支持的。5月5日，胡汉民复函称：“过去四五年，只见有个人，而不见有党”，“凡所措施，无不出于个人私意”。他表示希望知道得更具体一些：

亦欲稍闻方略，俾得先事预图，南方同志精神团结，意志不移，
遇有举措必竭诚襄助也。②

自此，冯、胡二人声息相通，联系日益密切。当年9月，冯玉祥决定以张家口为抗日基地。胡汉民派曹四勿赴泰山，发展冯加入新国民党，并提供经费一百万元。③

冯玉祥之外，胡汉民与张学良、韩复榘、阎锡山、孙殿英、石友三等人之间也均有信使往还。11月13日，胡汉民致函孙殿英，首称：“今日党国外遭于方张之寇，内劫于独裁之魁，前途危险之极。”次称：“南北当一致而不当分歧，在动作上，南北当互相促进，而不当各存观望。”可以看出，胡汉民期望，一旦举事，能够出现一个南北并起的局面。

华侨历来是革命党人的支柱，因此，胡汉民十分重视对国民党海外支部的工作。1932年，他致函美国总支部，指责蒋介石为

① 张允荣：《致展堂先生函》，1932年3月18日。

② 《致冯玉祥》。

③ 曹四勿回忆，引自谢幼田，《谢慧生先生年谱长编》未刊稿。其具体时间则据曹四勿先生向本文作者面述情况考定。

“劫持本党之军阀”。函称：

过去所施行者，实为民国以前相承一贯之军阀之治，而非本党之党治。盖在事实上，本党以军阀为梗之故，实未尝一日得行是政策也。

同年，又再次致函美国总支部，指责蒋介石等对日妥协。他说：“苟政府当局甘冒天下之不韪，而实行屈辱，则为党为国，必须严重反对。盖我人可一致于抗日，不能一致于降日也。”胡汉民的这些观点，符合海外华侨的民主、抗日要求，因此日益赢得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南洋等地国民党组织的支持。

当时，国内出现不少抗日或反蒋组织。公开的如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、东北民众讨倭军，秘密的如黄埔革命同学会、浙江革革同志互助社、中华民族自救会、励进社、青年军人社等，胡汉民均一一联系，予以支持。

胡汉民一贯标榜党治，在广泛联络各地反蒋力量的同时，便着手组建新国民党。该组织的建立时间，大体在1932年五、六月间。同年，胡汉民复蒋振函云：“所列重建本党之十问题，弟亦表同意，刻正分途进行，务以严明之纪律，团结同志，恢复民十三年以前一种自动革命之精神。”该组织秘密活动，以胡汉民为主席，邹鲁为书记长，“只要反蒋最坚决的人”^①，入党须宣誓，有自己的中央和地方组织。中央领导机构称为“中央干部”，地方领导机构称为“地方干部”。例如，在上海即设有“地方干部”，由陈嘉祐、熊克武、柏文蔚、程潜、刘芦隐任“干部委员”，以刘芦隐为书记长，其工作范围为苏、浙、皖、赣、湘、鄂、川七省，每省再设分部。^②不设分部的省分则设有特派员。它虽建立在国民党的基础上，但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新组织。

^① 曹四勿回忆，引自谢幼田，《谢慧生先生年谱长编》未刊稿。

^② 《致上海各同志》，1933年11月。

三 派遣部队北上，“以抗日为倒蒋”

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日益为国人所不满，胡汉民由于主张抗战，逐渐争得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拥护。1932年12月，张学良派秘书陈言赴港，会晤胡汉民。19日，胡汉民复函，鼓励其振作精神，坚决抗日。函称：

比月以来，外侮日深，晏处覆巢，宁有完卵。所期兄以决死之精神为民族求生路。桑榆之失，断可收于东隅，至于内政意见及南中同志意，经与陈同志详谈，俱托归报，希深察为幸。

1933年1月1日，日军突袭山海关，3日，山海关及临榆县城失守，张学良命陈言致电胡汉民，表示决心抵抗之意。2月4日，胡汉民因不见张的实际动作，派陈中孚携函北上督促。函中，胡汉民分析日本侵华的特点与中国面临的危险说：“弟谓日之于中国，其侵略方式为蚕食而非鲸吞，故经一度之攻城掠地，即出之以延宕和缓之手段，巧为解脱。当局受其愚蒙，国联受其欺骗，而日人之计乃大售。苟不能窥破此点，积极抵抗，并进而收复失地，则日人本此政策进行，华北终将沦亡，中国且为日有。”九一八事变之后，张学良备受国人指责，有口难言，但他曾将个中情况含蓄地告诉胡汉民。对此，胡汉民表示：

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，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。虽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，顾兄身当其任，究何以自解于国人？纵不为个人计，独不为数百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？

胡汉民称：西南虽主张抗日，但限于地域，效命无所，希望张学良能团结华北将领，振奋一心，抗击日本，自己将力为应援。2月25日，张学良复函胡汉民，表示抗日御侮的坚决意志，希望西南能从精神、物质两方面给予鼎助。函称：

良以不才，遭值多难，只思少裨艰局，庸敢计及一身，御侮决心，誓当不二。

然而，事情并不决定于张学良个人。3月4日，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，进迫长城脚下。7日，张学良致电国民党中央，引咎辞职，不久出洋。

当时，蒋介石专注于“剿共”。但是，他不能不顾及华北的危急局势。3月8日，蒋介石抵达石家庄。胡汉民认为蒋介石的北上将加强对华北的控制，危及将领间已经形成的联合局面。同月，胡汉民致函陈济棠、萧佛成、邹鲁、李宗仁、邓泽如、刘芦隐等六人称：“某为不抵抗主义者，华北为某所有，则抗战之希望已成灭绝。在此时对内对外，非设法打破某在华北之阴谋必无以策善后。”他提出四项对策：

1、选派军队北上，参加抗日。胡称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：“一以示西南抗日之诚，一以作华北将领之气，亦以戢某对日妥协之谋。”胡并指示：“此项部队对内对外必须与华北将领取同一之态度。”

2、成立华北军事组织。西南方面除同情赞助外，还须调遣人材，接济经费，作实际促进。

3、华北军事组织必须“以抗日救国为名”，并须笼罩鹿钟麟、韩复榘、阎锡山、冯玉祥及东北各旧部，西南方面亦应选派军事人员参加。

4、在北方成立西南统一办事机构，委派富有资望、能力的同志前往主持，统筹外交、政治、党务、军事各方面的工作。

函末，胡汉民表示：“万不能更持徘徊观望之态度”，“惟有投袂奋起，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^①

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签字后，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“剿共”，

① 《致伯南、佛成、海滨、德邻、泽如、芦隐》。

但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不忘抗日，逐渐与胡汉民等结合。1933年2月初，西南方面成立了包括广东、广西、福建三方的国防委员会，以陈济棠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林云陔为委员。其后，胡汉民陆续致函冯玉祥、宋哲元、孙殿英、石友三等，建议华北能建立同样的组织，以便“整齐抗日步调，俾南北两方于捍卫国家能互相促进”。^①3月1日，方振武变卖家产，在山西介休成立抗日救国军，首树义旗，誓师援热。当时，华北将领大多主张抗战，旧西北军方面并推鹿钟麟为总指挥。同月24日，鹿钟麟致电胡汉民、李宗仁等，欢迎西南方面“雄师北指”。电称：“此次西南若能从速出兵，督促作战，必能转移局势，确定抗日大计。”^②鹿自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即闲居天津。25日，胡汉民复电鹿钟麟，对他的“投袂奋起”表示欣慰，告以西南方面正在选派军队，对于华北将领的“自救救国”行动，愿提供“实际之援助”。^③

在胡汉民的倡议下，广东、广西、福建迅速筹组西南联军。胡汉民并致函刘湘、王家烈等，要求同时出动。3月下旬，福建援热部队自漳州、龙岩出发，计划经潮汕、东江至粤汉路与粤、桂两省部队汇合后通过湖南北上。4月4日，方振武部经过艰苦跋涉，抵达河北邯郸。15日，胡汉民致函陈济棠、李宗仁、蔡廷锴三人，认为联军北上问题，期在必行，但联络北方抗日军队亦不可缓。^④同月，胡汉民派其女木兰访问程潜，争取支持。当时，正是陈诚进攻中央苏区惨败之后。23日，程潜复函称：

木兰姪来，敬悉一切。关于各方情况，尽告木兰姪面达。自陈诚失败后，庆父大露恐怖之象，为西南出兵抗日最好时机。若失此机，

① 《致韩复榘、石友三》。

② 《广州转李德邻先生转季雨农先生》。

③ 《致鹿钟麟》。

④ 《致伯南、德邻、贤初》。

经彼多方弥缝，将来必更棘手也。①

庆父，借指蒋介石。古语云：“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。”信中，程潜不仅支持西南出兵抗日，而且表达了强烈的反蒋情绪。5月18日，胡汉民复函陈嘉祐、程潜，告以一项绝密计划：

西南抗日军队出发，以贤初为总师之任。渠以抗日为倒○〔蒋〕，如能师出武汉，北局有变，一切正可相机而动。②

胡汉民要求程潜密告湘军将领，“忍受此一关，以静俟大局之推展”，“华北局势必有急变”。贤初，蔡廷锴的字。他于4月12日被推为西南抗日军总指挥。此函表明，胡汉民、蔡廷锴等准备在师出武汉之后，与北方协同动作，掀起反蒋高潮。

由于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，因此，当时不少爱国人士（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）都认为抗日必先倒蒋，胡汉民等人的上述绝密计划，正是这一思想主张的体现。

四 支持华北抗日力量，筹备粤桂闽三省独立

华北果然动作了。

热河省会承德失陷后，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进行了英勇的抗战。但是，南京国民政府勇于对内，怯于对外，仍然专注“剿共”，无心对日本侵略作坚决、持久的斗争。5月3日，黄郛受命北上，谈判停战问题。在何应钦支持下，黄郛于22日与日方达成协议。26日，冯玉祥、方振武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，与共产党人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，宣布“结成抗日战线，武装保卫察省，进而收复失地”。③

① 《致展公》，1933年4月13日。

② 《致护黄、颂云》。

③ 《冯玉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》，《国闻周报》，第十卷第三十二期。

华北既经动作，胡汉民就准备把他的“师出武汉”计划付诸实施。5月29日，胡汉民在《致袞尧》函中说：

手书到时，宁府之对日屈辱已成事实。此间同志早经决定，联合华北将领一致反对。焕章同志刻已于26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，统率长城外各路义军及西北军旧部，西南抗日军亦积极北进，同时则大举剿共，使西南兵力推入长江。

胡汉民并准备在适当时期回到国内，宣布讨蒋，主持一切。同函又称：

须察省外交、军事、财政各事准备完竣，然后对误国、卖国之奸徒声罪致讨，方易收旋转乾坤之效。弟现正努力为根本之规画，诸事就绪，自必返国亲行主持一切也。

31日，塘沽协定签字，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与热河，胡汉民极为愤怒，立即向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拨款，并密电冯玉祥云：

请公立振义师，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○○、黄○○，即行讨蒋以抗日……此间当即一致动作。刻拨充○○元。①

末署“延、马、远、衣”。“延”为胡汉民，“马”为萧佛成，远为邓泽如，“衣”为邹鲁。②电稿中所称“何○○”、“黄○○”，当指何应钦与黄郛（膺白）。

在粤、桂、闽三省实力派中，李宗仁、白崇禧、蔡廷锴、蒋光鼐、陈铭枢等对抗日讨蒋都持积极态度，只有陈济棠犹疑不

① 《致焕公》。

② 延为胡汉民自署；马，马鸣，萧佛成化名，取佛教中马鸣菩萨之义；远，邓泽如化名，邓字远秋；衣，邹鲁化名，取邹鲁为衣冠文物之邦之义。

定，因此，南方要一致动作，必须首先说服陈济棠。6月3日，萧佛成致电胡汉民云：

昨与爵密谈约三小时之久。弟反复开陈，谓讨蒋不但可以救国，亦且可以巩固其个人地位。①

爵，指陈济棠。对于陈济棠说来，最重要的是巩固他已经取得的地盘和“南天王”的地位，要他参加抗日讨蒋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萧佛成反复开导之下，“爵似大觉悟”，表示了讨伐蒋、汪的决心，但同时声称，必须待蔡廷锴、陈铭枢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来粤共商。7日，陈铭枢、蒋光鼐、李宗仁、李品仙等抵达广州，萧佛成再度与陈济棠商谈，提出：1、西南独立，与南京脱离关系；福建公开加入西南；若福建出兵浙江，军饷由粤担任；2、华北、华中各将领仍须派员与之联络，若能先由彼方发动为佳。当日下午，萧佛成、邹鲁、邓泽如、唐绍仪、李宗仁等会谈。邹鲁问李宗仁，如果三省独立，粤不出兵而闽出兵，桂当何如？李宗仁初时感到难以回答，继而慷慨表示说：“不惟牺牲我们，且牺牲全省人民之利益以从其后。”②在此期间，邹鲁、萧佛成、陈融等与陈铭枢也进行了紧张的会谈。陈铭枢称：“抗日、剿共必要倒门神”，“门神现时虽未倒而等于倒，倒之后，应如何办法，我们应极注意。”陈并再三声明，他自己并未组织社会民主党。邹鲁等人对陈铭枢的态度很满意。6月10日，陈融致函胡汉民报告说：“跛兄连日所谈，均甚接近。”③1931年陈铭枢在香港时，所住旅馆失火，从窗口跳下，足部受伤，自此不良于行，胡汉民等因此在密札中称之为“跛兄”或“跛哥”。

三省会谈有了初步结果，但是西南联军的进展却并不很顺利。

① 《广州来电》。

② 陈融，《致跛兄电》。

③ 《黄梅致福兄》（陈融致胡汉民）。

在福建援热部队出发之后，广东派出了独立第四师，广西派出了第二十四师，准备联袂北上，何键并电令沿途各县妥为招待，但是，塘沽协定签字之后，蒋介石电令蔡廷锴，命援热部队火速回闽。当时，福建援热部队已经抵达湖南郴州、耒阳一带，不得已忍痛回师。

蔡部回闽，胡汉民的师出武汉计划便遭到挫折，但他仍积极活动，力图把握时机。6月17日，派程天固东行，探询对美外交；23日，派曾伯兴北上，联络阎锡山；7月3日，致函叶夏声，建议将各方捐赠援热部队的款项移赠方振武部。29日，致电海外国民党人黄滋、陈雨亭、李白俦云：

今两粤业已一致，福建方面尚有餉项问题未能解决，如磋商完善然后正式揭露，一面树立党政中枢，号召全国，一面组织联军，北出长江。长江、华北各军半有接洽，推倒国贼，指顾问也。

可见这时候，胡汉民还在准备“北出长江”，并准备“树立党政中枢”，“推倒国贼”，公然和南京政府对着干。电中说明：“福建方面尚有餉项问题未能解决”，显然包含着向海外募捐的意思在内。

在粤、桂、闽三省实力派中，粤方最富，桂、闽比较拮据。倘使陈济棠不肯拿出钱来，桂、闽二省很难长期支持一场对蒋介石的恶战。据蒋光鼐复邹鲁电云：

所示办法，本无不可，但未审已否商得桂方同意？本军穷饿，倘无两月积粮，不敢轻动……乞予一次先拨百万，以资应付。^①

未署“光。文。”文为12日。此电虽未署确切月份，但所述内容可

^① 《秋梦致福兄函》（陈融致胡汉民）。

与上述胡汉民电相印证，其时间当不会相距很远。

有几天，财政问题似乎不大了。8月1日，胡汉民致函陈嘉祐云：

今财政问题粗告解决，惟西南军事动作如何进求一致，财政问题如何筹划挹注，俾达粤、桂、闽三省联军分出长江之目的，仍在详密规画之中。

然而，胡汉民乐观得太早了，财政问题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。果然，8月18日，胡汉民《复袞尧》电又云：

此间一切仍在计划推进中，粤将领所视为困难者厥为财政，故一切措施，遂未能放手做去。至内部意见，虽有小小不同，然于倒某救国一点固甚一致也。

电中所称“粤将领”，当指陈济棠，这位财神爷不肯拿钱，其他种种，当然无法“放手做去”。

正当胡汉民在南方为财政和内部“小小不同意见”而苦恼之际，北方却风云突变。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，浴血苦战，迅速收复察北大片失地，进而准备规复东北四省。然而，南京政府一面组织大军“围剿”，一面分化瓦解，同盟军的境况日益艰难。8月5日，冯玉祥通电收束军事，交出察省军政大权，随即回泰山隐居。冯的失败给了胡汉民巨大打击。24日，胡汉民电冯云：“左右入鲁，抗日工作亦由此告一段落。观察大势，时局更新，似尚有待。”30日，致电柏文蔚，除了希望他继续维系“长江军事”外，特别说明，“广东方面推动不易，今方别寻途径”。^①可见胡汉民对陈济棠已经很失望了。

^① 《致烈武》。

冯玉祥退入泰山以后，中共河北“前委”决定支持冯部方振武、吉鸿昌两军继续奋斗。方、吉将抗日同盟军易名抗日讨贼军，明确揭起反蒋旗帜，准备沿热察边境，经十三陵、小汤山等地，东进冀东。①9月20日，方、吉两军进入河北。23日，方部进占牛栏山，作袭击北平准备。对抗日讨贼军，胡汉民曾力图予以支援。9月25日，致电萧佛成等，声称方部“且进取密云，当不忍其给养之不给，坐视其覆亡”。29日，方振武致电胡汉民，宣称“在钧座指导下抗日讨贼”，“即令牺牲万有，亦所不辞”。方并称，华北外交关系重要，要求胡选派干员，常驻天津主持一切。②10月5日，方振武致电胡汉民，报告在南口、昌平、汤山一带的胜利，声称计日可达北平城郊，要求胡汉民“推动各方火速出兵，以收南北夹击之速效”。③6日，再电胡汉民：

不日直捣北平，务希火速推动，群起讨贼，国家幸甚！倚戈陈词。④

方振武的崛起再一次燃起了胡汉民的希望。他致电陈融说：

假如其遂能入北平，或可造一与西南同样局面，为联军会议制以待各方之进展耳。⑤

6日，胡汉民决定以广东后援会名义一次拨给方部军费三万元至五万元，但是，这笔款项未及寄出，方军即因孤立无援失败。⑥

尽管冯玉祥、方振武先后失败，但是，胡汉民仍然认为，华北是具有潜力的地区。10月19日，胡汉民任命何子佩为华北军事联络专

① 《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50页。

② 《天津来电》。

③④ 《广州来电》。

⑤ 《致力兄》。

⑥ 胡汉民《致陈济棠》，1933年10月19日。

员，要求他代为慰问华北同志，说明胡的内政、外交主张以及对于全国的规画。胡汉民为其规定的工作方针为：

1、切实团结华北革命将领，通电讨贼，并肃清盘踞北平之反动势力，树立华北之中心救国组织；

2、以相等于政务委员会、军事委员会之组织为最宜。华北将领之通电发出，组织成立，西南即树立党政中枢，正式宣告与卖国政府断绝关系，并领导华北及长江之革命力量，声讨独夫，从事抗日。

3、为外交上之运用计，不妨暂以安定华北为主张，而不以抗日为标榜，但华北将领之通电必须痛数独夫罪状，示与卖国政府绝缘，无复有妥协余地。

4、华北将领通电发出、组织成立后，此间即派遣大员北来，规画一切。其财政外交上之责任，纯由西南革命政府负之，但华北将领必须于抗日目标下切实坚持并接受西南革命政府之领导，完成讨贼抗日之全功。^①

在派出何子佩的同时，胡汉民又分函阎锡山、冯玉祥。致阎函总结前数月失败的经验教训，认为“不独南北未能一致，即北与北间亦多隔阂”，要求阎“领导群伦，使华北力量团结，与西南为一致”。^②致冯函则通报南方情况，说明“此间主旨，仍在团结粤、桂、闽诸省，相时而动”。^③

五 福建事变期间

胡汉民计划中的西南独立，由于陈济棠迁延犹疑等原因，终于未能发动，然而福建方面却终于等不及了。

十九路军调福建“剿共”后，陈铭枢遭到蒋介石、汪精卫的

^① 胡汉民，《致何子佩》，1933年10月19日。

^② 《致阎锡山》，1933年11月2日。

^③ 《致冯玉祥》，1933年11月11日。

压迫，无法在南京立足。1933年1月，愤而赴欧洲考察，同年回国，活动于香港、福建之间，联络李济深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人，计划反蒋，同时派人与中国共产党联系，讨论合作问题。9月，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。10月，陈铭枢、李济深等在香港聚会，决定在福州成立反蒋抗日的人民革命政府。11月16日，李济深派其弟李济汶持函面见胡汉民，函称：

深南归，已历一载，本意在追随吾师之后，团结西南各省，共同讨贼救国。顾蹉跎一载，数失良机，而有实力之当局者持重如故，循此而往，势不至任国贼断送国家不止。而十九路军以处境较困，责任较明，有义无反顾，迫不及待之势。连日得其函电，促往商讨讨贼大计，照连日报章上所载情形，亦似有即行发动讨贼之趋势。故深决定即行前往观察督促，进行一切。

李济深要求胡汉民“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，共同讨贼”，并对闽中各事随时加以指导。18日，李济深与陈友仁、徐谦等到达福州。20日，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，议决废除中华民国年号，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。21日，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，旋即组织生产人民党。同日，陈铭枢、李济深、蒋光鼐、蔡廷锴四人联名致电胡汉民、萧佛成等，指斥蒋介石独裁祸国，媚日残民，追述三省近年来共谋反蒋的历史。电报以“陈涉发难于先”自喻，以“沛公继起于后”喻胡，要求胡汉民等“本历来之主张，为一致之行动”。^①

三省联合倒蒋本来是胡汉民梦寐以求的事。但是，福建方面改国号，造新党，特别是联合共产党等做法，都超出了胡汉民所允许的范围。因此，最初他颇为迟疑，不知道应该如何答复陈铭枢等人的来电：“措词太硬，则宁方得意，桂方怀疑；太软则虑

^① 《陈铭枢等来电》，《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》。

跋等有以藉口为反宣传，发生其他之不利”。^①经过反复考虑，他决定了如下对策：

· 对宁闽——两罪两责而偏于责宁。11月27日，胡汉民致电冯玉祥称：“大致对宁对闽，今后将同在我人反对之列。”同日，又致电杨虎城称：“闽中之变，亦实南京卖国政策激之使然，否则何至铤而走险，自弃其抗日剿共之历史至于此极，故我人固宜罪闽，然尤当罪宁也。”当时，广东有人主张蒋介石下野，胡汉民赞成这一主张，认为这样可以：1.示天下以公道；2.消释十九友（指十九路军——笔者）一部分之热愤；3.使桂方及其他反蒋者同情于我。^②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根据胡汉民的意见，曾经发电要求蒋介石、汪精卫“避路让贤”。电称：“推寻祸始，不能不深咎于独裁政局之罪深恶极也。”

对粤桂——“救正调和”。陈济棠和陈铭枢有矛盾，因此，他的兴趣一在于防闽，二在于防共；李宗仁则急于反蒋，福建事变后立即致电陈济棠等，建议三省合兵，开府广州^③，树立中樞。胡汉民对这两种态度都不满意。他曾在一封信中说：“爵专心对闽，故反蒋不敢太着力；不专心对蒋，几欲与闽附和而忘却共匪之为祸。”^④这里说的“不”以及其他密札中的“不孤”，均指李宗仁。11月下旬，广西方面两次派人会晤胡汉民，催促行动。第一次，胡汉民答以“派人与各方接洽，为召集各省代表一致反蒋之预备”；第二次，胡汉民答以“讨蒋以桂为前方，粤为后方，防共以粤为前方，桂为后方”。^⑤

尽管胡汉民对福建方面的做法不满意，但是，事变的发生毕竟造成了一种形势，使他觉得有机可乘，因此，一度考虑过组建

①② 《致力兄》。

③ 《致福兄》。

④ 《致力兄》。按，李宗仁，字德邻。《论语·里仁》有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的说法，故胡汉民等以“不孤”、“不”作为李宗仁的代名。

⑤ 《致力兄》。

政府问题。11月31日，他致函陈融说：

开府地点是一问题，而第一步似以广西为适当，其理由有五：人心信仰，无复怀疑一也；素无财富之名，则不必铺排而各方来者易于应付二也；因湘鄂吃紧易于联络应援三也；外交较易应付，不遽为红毛、矮子之威胁四也；敌用飞机袭击及闽中大军之使用俱不便五也。^①

胡汉民并告诉陈融，闽变初起时，他曾就此和李宗仁商量过，如果现在陈济棠仍以先发为难，不愿意在广州开府，则不如选择广西。12月中旬，他又致电在上海的陈群、孙科、胡毅生等人称：“前此欲以组府号召天下讨蒋，今则当促动与联合反蒋之战线进行，至蒋势穷蹙，然后组府。”^②18日，致驻美国三藩市总干部电称：“组府一事，尚非今兹所可实行。”显然，胡汉民的“组府”计划碰到困难，不得不向后推延了。

福建事变后，南京政府企图拉拢胡汉民及西南实力派。12月11日，张继等到港，与胡汉民会谈，呼吁团结，邀其入京。胡汉民答称：“你们请我到南京，我想请你们出南京，何以故？因为要你们认清自身的地位，尊重自身的人格，不附和军阀去叛党卖国。”他提出，南京当局是导致事变的“罪魁”，必须实行政治和党务的根本改革。^③15日，胡汉民发表《对时局宣言》，声称：“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，一绝对的军阀统治之现象也。枪之所在，即权之所寄。”《宣言》提出：“独裁卖国之南京军权统治，叛党联共之福建统治，必同时清除之，以组织一真能代表国家人民利益之政府。”^④《宣言》并提出“带兵者绝对不得干预政事”，“中央与地方实行均权制度”等主张。22日，张继等访粤、桂后回港，再次与胡汉民会谈。关于此次会谈内容，胡汉民

① 《戮力翁》。

② 《工戮力翁》（胡汉民致陈融）。

③ 胡汉民，《政治上之责任问题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第3卷第1期。

④ 《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》。

密告陈融说：

弟见渊时，已动以闽事无论如何必先赤化而终落倭人之手，倭得闽则两广亦将为其他之某国之染指，故此时粤桂难以坐视，而桂尤不能久忍，故惟有政治解决之一途。^①

渊，指张继。所谓“政治解决”，胡汉民概括为“蒋汪下野，福建回头”八字。当时，南京政府积极准备对闽用兵，胡汉民担心此举会使十九路军与共产党的关系进一步加深，竭力加以反对。他说：

如此，不论胜负，闽军与八字脚之结合必愈深而无从自拔矣。彭德怀、朱德附八字〈脚〉后已使门神办不了，假如十九号赤化……走险愈深，岂易收拾耶！^②

同月28日，胡汉民在《复袁冠新等》函中又说：

人民生计垂绝，国脉危于累卵，凡可以循和平之轨道以贯革命之主张者，皆当遵从。总之，南京统治弟以为实不足定。

此函表明，在军事倒蒋屡屡失败之后，胡汉民“政治解决”的意识再度萌生了。

福建事变领导人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。12月中旬，十九路军将领致电胡汉民，声称“事先未明真相，全为一二野心家包办，致铸此错”^③，要求胡派人前往指示办法。胡旋即派黄河鲤〔澧〕前往，指示以“复国徽、复党籍为先决，捕八字脚为贡献”。^④所谓“复国徽、复党籍”，即要求废止中华共和国称号，

① 《工致松兄》（胡汉民致陈融）。

② 《工致松兄》（胡汉民致世融）。

③ 转引自胡汉民《致驻三藩市总干部》，1933年12月18日。

④ 《工致力翁》。

恢复国民党党籍，所谓“捕八字脚”，即反共。1934年1月，南京政府对十九路军发动“讨伐”，福建人民政府日益危急，李济深、陈铭枢电告胡汉民，表示愿按其办法，“取消一切组织，回十九路军本来，连属西南”。^①胡旋即致电在上海的程天固，请其迅速与孙科商量，设法使蒋军停止进攻。^②但是，第十九路军已呈土崩瓦解之势。1月21日，沈光汉、毛维寿等通电“脱离人民政府，拥护中央”。其后，胡汉民曾为保护十九路军的残余力量做过一些工作。24日，胡汉民致电阎锡山云：

闻闽中荒谬之政党组织已无形解体，故于善后一切，正督促各方进行，务使此抗日讨贼之力量得以保护。

2月2日，陈济棠派人至龙岩会晤蔡廷锴，接洽收编十九路军残部，得到蔡的同意。该部旋即改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。

六 再次联络张学良

胡汉民一直将东北军视为重要的抗日反蒋力量。1933年3月，张学良决定下野出洋，12日，抵达上海。25日，胡汉民派何思毅持函劝阻，函称：

自热河沦陷，吾兄去职，华北局面，日趋混沌。兄典军东北，久历岁时，今为人所乘，有怀莫白。闻将有远适异国之志，弟以为个人权力为轻，党国安危为重，愀然远行，似非其时。即不得已而行，亦须力策善后，挽回危局。是非所在，天下不乏同情，此间同志正具决心为兄后盾也。

4月8日，张学良复函，对胡汉民的关怀表示感谢，声言决不敢抛弃救国责任。函称：

^{①②} 《致力、海》（致陈融、邹鲁）。

良乍息薪劳，闭门自讼，乃蒙远垂记注，勗以方来，高谊殷隆，曷胜感奋。抚时多艰，耻痛毋忘，苟图少补涓尘，敢委匹夫之责。

但是对于胡汉民的建议，张学良却完全没有任何答复，仅说：“尚祈时锡教言，俾其待罪之身，多叨宏益。”

福建事变爆发，张学良得到来自国内秘书的电报：“现在有一种动向在拉我们加入反对蒋介石的派系，务请立即返回。”^①于是，张学良决定东归。他一面派陈博生赴闽表示支持，同时电派陈言赴港向胡汉民致意。12月23日，胡汉民派刘显丞迎接张学良，报告国内政情及胡的意图。1934年1月6日，张学良、胡汉民在香港会晤。8日，张学良抵达上海。12日，陈言北返，邀刘显丞同行，胡汉民委托二人再次向张学良陈述自己的意图，劝张“澈底做去”，函称：

至对大局主张，亦断不以环境之转变而有所移易也。国事至此，有救亡之责者，不当徇于目前之小利，惟宜澈底做去，则中国庶有可为，想存亡绝续之间，先生必能熟之。

刘显丞抵沪后，张学良为了躲避特务的注意，于深夜在一个外国人的家里约见刘。张称：“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，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，免其猜忌。”张并称该计划“须与两广互为呼应”，嘱刘显丞回港报告，如西南方面主张仍前不变，则东北当密派军事代表来粤切商。^②胡汉民得到刘显丞的报告后，即致函陈融，命其与陈济棠密商。函称：“弟意我人此时宜厚结广西而密与北方联络，沉机观变。如伯兄意亦谓然，弟当令刘秘密上省，以备伯兄面询一切。”^③3月1日，张学良就任豫、鄂、皖

① 傅虹霖：《张学良的政治生涯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98页。

② 《四工致松兄》（胡汉民致陈融）。

③ 同上。

三省“剿匪”总司令部副总司令，胡汉民认为此事“利害各半”，再次致函陈融说：

我已囑刘显丞可即与小张切商军事之联络，小张就“剿匪”职，其部队将来必调长江上下游，此点利害各半，利在与南方联络，而害在易被分割、分化也。^①

同月27日，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、西南政务会联席会议，李宗仁自桂前来出席，他积极赞成联络张学良的方针。会后，陈融致函胡汉民说：“此间联小张，亦政策之一变，此事不孤亦甚著力，言非合南北之力以挟门神不可。”^②西南的反蒋派们一直渴望着能演出《水浒》中“武松醉打蒋门神”的痛快淋漓的场面，张学良的归来使他们增添了几分希望。

哈佛所藏胡汉民档案中没有胡、张之间进一步联系的资料，看来是张学良逐渐怀疑反蒋抗日而倾向于拥蒋抗日了。

七 开府西北与军事倒蒋梦想的破灭

福建事变失败后，胡汉民一面联络张学良，一面将目光注视到西北。

胡汉民和阎锡山之间信使往来频繁，和杨虎城也早有联系。6月7日电杨，希望他“内除奸凶，外抗暴日”。8月26日，再电云：“望团结各同志，密为策进。”11月27日，三电云：“尚希一致奋起，共为主义效力。”同日，致电吉鸿昌云：

今后救国大计，厥惟归本主义，致力于西南、西北之联络。今平津各地势为暴日所必争，曷若萃我主力，树军事力量于西北。^③

① 《致力翁》。

② 《致延兄》。

③ 《致世五总指挥》。

此电表明，胡汉民的目光在向西北转移了。

1934年1月，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，准备就任青海西区督办一职。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，孙殿英部曾在赤峰英勇阻击日军，得到舆论好评，因此，中国共产党派南汉宸、常黎夫等人随孙部工作，准备在适当时机，会同红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，摧毁宁夏、青海的回军，通电反蒋抗日。^①胡汉民不了解上述情况，但他也企图依靠孙殿英，联络阎锡山、杨虎城，开府西北。1934年2月10日，胡汉民致电孙殿英，指示其“巩固宁夏，进图甘肃。倘有可为，宜图进取，否则保存实力，期为后此之抗争”。同月15日，胡汉民致函陈融说：

孙殿英势力似不可侮，晋阎为助，已成公开之秘密。局面展开，或有如梯云所云，晋、陕、桂联合倒府、组府之望。^②

梯云，指伍朝枢。“晋、陕、桂倒府、组府之望”云云，反映出胡汉民等屡遭失败之后的新寻求。

然而，胡汉民过于乐观了。宁夏、青海一直是马家天下，南京政府命令孙部西进，一是为阻止孙部和冯玉祥等抗日力量结合，一是为了借刀杀人。孙军一进入宁夏，即与马鸿逵部交火，屡战不利。同年2月，何应钦下令对孙部实行围剿，孙殿英饷尽弹缺，一再致电胡汉民、陈济棠呼吁援助。陈济棠本已答应资助数万元，但不见行动，口惠而实不至。20日，胡汉民再函陈融，要求由总部拨借20万元。函称：

孙之成败，实与南北大局攸关。未审伯南兄前许之数万元已汇去否？弟意此时牵制门神，不使即以全力对我者惟此一路，且可因此牵动晋、陕抗△〔蒋〕，最低限，阎、韩、杨、孙亦不能不因此团结自保。^③

① 米暂沉，《杨虎城传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，56—57页。

② 《四工致松翁》。

③ 《四工致松兄》。

21日，胡汉民致电李自立，提出孙部给养断绝，希望杨虎城与晋绥当局予以实际援助。3月7日，胡汉民再电孙殿英，指示其团结西北陕、绥、晋诸友军，“逐渐酝酿，形成一革命集团”。

在西北各种军事力量中，杨虎城是愿意援助孙军的。孙、杨之间约定，共同通电，呼吁抗日反蒋，稿子已经拟好并经孙殿英签字，未及发出，孙殿英就失败了。^①20日，孙殿英通电下野，离开部队。

在旧中国，完全缺乏从事公开的民主政治活动的条件，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最后都不得不取决于军事。胡汉民是一介文人，他所依靠的主要是各地军阀和地方实力派。这些实力派，各有山头，各有利益所在。他们往往把保存自己放在第一位，很难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。

抗日讨贼军失败后，方振武南逃香港，吉鸿昌隐居天津，但二人都斗志弥坚。方振武草拟了一份在黄河、长江流域的军事工作计划，经胡汉民、邹鲁等同意后，自动申请去广西、湖南边境活动。^②吉鸿昌则与南汉宸等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，积极联络各地抗日反蒋力量。胡汉民一度派熊克武去天津活动，准备在当地建立“北方军事委员会。”^③1934年9月，又派刘少南北行，联络于学忠、吉鸿昌等。^④11月9日，吉鸿昌等在天津国民饭店研究工作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包围，刘少南当场牺牲。^⑤

在一次次失败之后，胡汉民的军事倒蒋梦想终于破灭。

① 米哲沅：《杨虎城传》，57页。

② 胡汉民《致邹鲁函》，1934年5月16日；1934年6月2日，《致佛成、海滨》，1934年6月。

③ 胡汉民：《致萧佛成》，1934年1月4日。

④ 胡汉民：《致于学忠函》，1934年9月21日。

⑤ 《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》，59页。

八 抵制五全大会

在胡汉民的支持下，西南不仅长期维持着半独立状态，而且在党务上，也对南京国民党当局采取不合作政策，尽力抵制各种会议。

还在1932年3月，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，胡汉民即以“政见不同”为理由，拒绝参加。^①1933年3月，国民党中常会筹议于7月1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。同月20日，胡汉民致电阎锡山说：

今日当局对日既出于不和、不战、不守、不走之一途，大势所趋，惟归屈辱，欲嫁其屈辱之罪责，则必力求为分谤计，故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说，遂为南京党部所决议。西南同志于宁中此议，固持反对，如反对不成，则惟有为对抗会议之筹备。

4月4日，唐绍仪、胡汉民等通电反对，认为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“不独无此必要，且不当行”，迫使南京方面取消此议。

根据国民党党章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1933年11月召开。当年8月，唐绍仪、萧佛成、陈济棠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反对，迫使南京方面不得不宣布展期一年。1934年7月，胡汉民鉴于大会期近，于23日致电陈雨亭、李白侗说：

关于五全会问题，海外支部不妨准备参加。倘西南发动能早，不参加固无问题，否则亦可运动各方拟具重要提案，根据党纲，就现状抨击其殆〔殆〕误党国。

8月12日，南京方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五全大会，讨论召集国民大会、修改总章、推进党务、确定施政方针等四项议题。胡

^① 《对十九路军以援绝撤退淞沪之谈话》，《远东日报》，1932年3月4日。

汉民仍然反对召集这样一次会议。24日他致电李烈钧等，表示将“从根本上破坏”宁方计划，但如来不及，也准备派人参加，提出西南方面的根本主张。9月8日，胡汉民、陈济棠、李宗仁等21人致电国民党中央，认为南京方面所提议题，“空洞落漠”，“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”。胡等自提议案四项，要求“整飭政治风纪，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”，“确立外交方针并国防计划，以维护国家之生存”。^①该电通称“齐电”，发出后，南京方面“置而不议，受而不答”，严禁各地报纸登载。25日，胡汉民等29人再电国民党中央，提出两项要求：1.履行本党“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权”之政纲，容许一般人民对于政治、外交之建议及批评。2.厉行本党民主集权制，予中央委员及海内外各级党部、党员对于党务、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应有充分建议及批评之完全自由。胡汉民等激烈地批评南京方面“党同伐异，自为派系，钳制同志，变本加厉”。电称：“苟不能恢复党员对于时政之建议、讨论、批评之自由，则此种大会断不足以代表全党之意志，徒为少数人所把持，以施展其僭窃本党之阴谋。”胡汉民等并要求，给予党员以选举代表之完全自由权。该电通称“有”电。^②10月17日，胡汉民发表《为五全大会告同志》，声称五全大会“只是军权统治的五全大会”，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五全大会。^③胡汉民作了宁方不接受齐、有两电的充分思想准备，计划在必要时单独召开代表大会，宣布蒋介石、汪精卫等“叛党、卖国罪状，开除其党籍”，同时，建立新的党的“中枢”。^④

对于胡汉民等人的做法，南京方面自然很恼火。但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拥有很高的威望，他的周围又团聚着一批老国民党人

① 《齐电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4卷4期。

② 《三民主义月刊》4卷4期。

③ 同上。

④ 《致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函》，1934年9月25日；《致邹鲁等函》，1934年9月30日。

和地方实力派。南京方面不能无视这一股力量。为了促进宁粤合作，10月8日，南京方面推孔祥熙出面致函胡汉民，声称五全大会开幕在即，邀请胡“早日命驾来京，主持一切”。10月中旬，王宠惠携孔函南下，面见胡汉民、萧佛成等。王称：“此来只以第三者之资格，作双方意见之传达，绝非代表北方任何人或任何方面。”^①又称：“南京中央同志很盼望和平，希望西南同志对于南京种种举动，予以谅解。”^②王并称：汪对胡展堂先生毫无恶意，蒋则力促余迅速南下，征求西南对时局意见，以便合作问题得以早日解决。^③10月28日，胡汉民对法报记者发表谈话，对王宠惠此行表示不满。胡称：“当道诸人仅于口头上希望余等对彼所实行之政策予以谅解，忽略事实及国家之危机，而趋重私人之情感方面，以求私人间之谅解。此种态度，恰与余历来对事不对人的主张相反，极为余所不取。”胡并进一步指责：“南京政府之上，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，彼以一军事领袖，在行政上而可以擅自发号施令，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，又可以组织蓝衣党，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义。”^④

自1933年1月起，胡汉民即在香港创办《三民主义月刊》，作为反蒋舆论机关。王宠惠南来前后，胡汉民多次致函《三民主义月刊》和邹鲁等人，要求加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。10月18日函提出“就时局现状及本党主义、历史，总论南京军阀蓝化中国政策之荒谬”，同时指定《三民主义月刊》4卷5期为“反蓝专号”。胡汉民并亲为该刊撰写《武力统治者的法西斯蒂运动》，指责蒋介石“保存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，变更中国国民党的实质”，“以三民主义为标榜，而实际推行的，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”。

召开五全大会本来是汪精卫的主张，蒋介石的兴趣并不很

①③ 《萧佛成先生关于宁粤合作之谈话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4卷5期。

② 《和平运动》，同上。

④ 《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4卷5期。

大，西南方面既然强烈反对，蒋介石也就主张从缓，指示南京方面宣布五中全会延期，于12月10日先行召开四届五中全会，以便腾出时间，继续做胡汉民等人的工作。

胡汉民终于胜了一个回合。

九 王、孙说合与蒋、胡通信

胡汉民既不肯入京，又不同意召开五中全会，蒋介石只好作让步的准备：一是部分采纳胡汉民的“均权”方案，一是设法使对日妥协、名声不好的汪精卫下台。

胡汉民被释后，即积极提倡“均权”。1931年11月，他从上海到广州，在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称：“满清以集权而亡，袁世凯以集权而死，今之人以集权而乱。”^①广州“四大”中，胡汉民又与孙科、陈济棠、李宗仁、伍朝枢共同提出“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”。1934年2月至3月，他连续发表《论均权制度》、《再论均权制度》等文，提出具体方案，同时指责南京方面标榜集权，实为“集权于南京军阀”。胡汉民声称：“实行均权制度，是中国今日唯一的需要。”

同年11月，蒋介石、汪精卫拟订了一项中央与地方“均权”的方案，提出：法制方面，中央规定政治原则，地方制定实施办法；用人方面，地方可选择保荐，由中央任命等。该方案于27日由蒋、汪以联名通电的形式发布。同月末，蒋介石派王宠惠、孙科再次赴港，会晤胡汉民。王、孙携有蒋介石及蒋介石、汪精卫、居正、叶楚傖、陈果夫、于右任等中央常委的函件。蒋函云：

兹请亮畴、哲生两同志代谒左右，商承党国大计，祈与详洽一切，并愿早日命驾蒞沪，俾得面罄所怀。

^① 《论均权制度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3卷2期。

蒋介石等六人函云：

党国大计，亟待解决，深盼先生驾临京沪，无任跂祷。

12月3日，王、孙到港，次日会谈。王、孙“郑重”代表蒋介石要求胡汉民等人谅解，并称：蒋介石已认为内政外交确有改革必要。王、孙特别谈到蒋汪27日通电系由蒋定稿，汪副署，声称其所以要求与胡见面，乃是为了“当面决定一切方案，期于施行适当”。胡汉民则批评27日通电不是“根本办法”。王、孙又称：蒋介石的意思是：“不只局部问题可以改造，即整个问题亦可改造，对水云不成问题”。水云，宋代词人汪元量的号，这里借指汪精卫；“不成问题”云云，暗示汪精卫可以下台。对此，胡汉民表示说：“我向来对事不对人，但以为如此可使一切事情圆滑易行，则我亦不反对。”^①在多年的矛盾冲突之后，蒋介石采取主动，派人道歉，胡汉民感到了某种满足，因此会谈气氛“和好”。

在此后的会谈中，胡汉民提出治本与治标两个方案。所谓治本，即要求蒋介石接受1931年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和齐、有两电；所谓治标，即开放人民言论集会之自由，确定入川剿共，不作大兵压境之威胁，对于此间朋友同志，不得敌视，而猖獗杀人之组织须即解散。^②孙科和胡汉民有联盟反蒋的历史。某日下午，他和胡汉民作了一次深谈，孙称：“先去水云，终是一手段，且此时不须西南说话，只作为改用比较可以接纳西南政府之人，则两方接触，不致急剧。”孙并称，他本人无意重作冯妇，建议推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，他说：“门之诚意，尚不可知，什么院长滋味，我亦不愿再尝，不如再用门之所嚮，如庸之者。”胡汉民认为倒阁一类运动不足以救亡，撤去汪的院长，换汤不换药，也不足以求谅解，因此表示说：“此事我不反对，然亦不能说

^① 胡汉民：《致松兄》。

^② 胡汉民：《致松兄》，1934年12月17日。

是赞同，至于门无诚意，则我看得甚为清楚。”^①

12月8日，孙科先行北返，行前，孙科问胡汉民还有什么具体意见，胡称：“须先确定今后之政治基础为军权统治，抑为民权统治”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和平便有了途径，协作也有了头绪。^②他托孙科带一封信给蒋介石：

自民二十年后，久阙音问。亮侑、哲生两兄来，藉获手书，甚感关注。弟三年养痾海隅，而时受风寒侵袭，血压久治未低。闻尊体近日亦不能无小病，视以前精力稍逊，诚为兄系念不已。国家大计，弟以为总理已垂示甚周，故数年来仍悉心体认而莫敢外。此次与亮、哲两兄所谈，亦惟此旨，即托其一一面达，其间亦非片楮所能尽也。

这封信有原则，有礼貌，冷淡中略露几分情谊，显示了胡汉民对宁方的合作要求既不接受，又不拒绝的态度，留有充分的伸缩余地。

但是，在其他场合，胡汉民对蒋介石的攻击火力并未减弱。12月15日，胡汉民发表文章指责南京方面“剽窃总理之均权主张，希望在军权统治之下实行其均权制度”。^③然而，这不过是一种姿态。1935年1月20日，王宠惠分访蒋介石、汪精卫，商谈迎胡入京及合作问题。28日，胡汉民派李晓生北行，与王宠惠、孙科会谈。2月初，蒋介石接见李晓生，11日，蒋介石致函胡汉民称：

弟决入川剿赤，以后道途日远，关山间隔，徒切想念。党国危急，四顾茫茫，甚盼后方同志，无间彼此，以谋团结，以挽重

① 《工致力兄》。

② 《和平协作之真伪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5卷1期。

③ 《军权与均权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4卷6期。

危之局，弟所望者惟此而已。晓生同志转述厚意，故人情殷，敢不心领，亦望先生为国珍重。

表示“入川剿赤”，算是答应了胡汉民的一项条件，“故人情殷”云云，算是表达了重修旧好的愿望。

本来，在王宠惠等开始说合之际，胡汉民密告胡毅生等称：“必须掀起更大的风潮，形成分裂、对抗，乃有效果。”^①现在，经过王、孙说合之后，胡汉民的态度变化了。3月5日他复电李晓生说：

入川剿赤与对日坚持，皆与我人意见上已渐趋近，而彻底改革一切错误政策更为必要，惟有暂以分工为合作。^②

虽然还强调“分工”，但毕竟出现“合作”的字眼了。

十 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引诱

中国的分裂状态有利于日本侵略，因此，日本帝国主义者使用各种手段，力图加深并扩大中国的分裂。福建事变后，日本方面不断派人拉拢胡汉民，表示愿意提供武器和金钱的支援，甚至以支持胡汉民当总统相饵。胡汉民的原则是，坚决要求收复东三省，可以接受日方援助，但不接受任何附加条件。

1934年2月，日本有几个武官到港，“问候”并探询胡汉民对中日前途等问题的主张，胡答称：

“日本是侵略国，中国是被侵略国，中日两国要恢复友好关

① <致溥、毅两兄>。

② <四工致晓兄>。

系，唯一的办法只有日本自动交还东三省给中国。

日本武官诡称：“日本并没有侵略满洲，满洲独立，是三千万满洲国人民的愿望，这种民治精神，日本不能干预。”这几句话引起胡汉民的厌恶，他立即正颜厉色地斥责说：

你们来是拜候我的吗？来拜候我，是应该讲实话的，不讲实话，就请你们出外去。我不知道甚么是“满洲国”人民的民治精神，只知道东三省是中华民国的领土。你们做这种假戏来欺骗世界，还把这假戏来向我巧辩吗？①

其后，胡汉民即发表文章，阐明孙中山“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”的思想。他宣称：中国的外交政策，应当确立于“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”这一基点上。“凡能帮助中国达到这个目的，德澳克拉西的国际也好，希〔布〕尔什维克的组织也好。我们不妨同情协作。”②还在1933年，胡汉民就鼓励西南方面与苏联发展贸易关系，并派陈群赴沪致力此事。③这里，联俄制日的思想就更加明确了。

日本武官的初次探询失败。同年4月8日，又由萱野长知出面致函胡汉民，鼓励中国实行“不战”政策。函称：

今东四省已成独立，而内蒙、伊犁、青海、新疆、康藏等处，亦归英俄竞夺之区。云南一角，忽成英国势力范围，东亚危机实不堪寒心也。弟以为保全中国之道，唯有不战二字而已。

同函并称：救国之大策，在于继承犬养毅与孙中山的遗教，实行“日华和平的合作。”萱野说：

①② 胡汉民：《国际现势观察远东问题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，3卷3期。

③ 胡汉民，《致啸林》，1933年3月30日。

世界大和平者，即在国境之撤废，在世界大同，是吾人之最终理想也。但现在缔结日华两国关税互惠条约，为平等资格而实行木堂、中山两先辈之遗志，打世界的大和平之先手，长江南北皆可望风合流无疑也，则是和平统一之初步。

萱野声称：如胡汉民赞成此意，“即应宣布西南独立，进就总统之职，弟必行积极之援助，亦运动敝国迅速承认西南政府”。他表示，将于5月上旬来华接洽。^①

萱野是孙中山的老朋友，同盟会时代曾积极支援中国革命。胡汉民的复信称：

手教诵悉，言及孙总理平生之主张，尤令人感慨不已。盖现实之状态，去之益远，其责任果谁负耶！

言外之意是，蒋介石和南京当局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，中国现状和孙中山的遗愿相距甚远。胡汉民表示：“足下能来一游，至所欢迎。”

同年，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策划在中秋节前实现“华北自治”，疆域包括长江以北各省及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新疆、察哈尔、绥远与宁夏等地，由吴景濂负责政治，吴佩孚负责军事。计划确定后派唐宝锜赴粤，与邹鲁商谈，声称如粤方军队讨伐蒋介石，可提供军械，并借款五千万。^②此事胡汉民未予理睬。

这一时期，到广东活动的还有日本特务和知鹰二，由曾任广州市长的刘纪文接谈。胡汉民指示说：

① 此函仅署4月8日，年代据内容及萱野行踪考定。

② 《力致福兄》。

弟处无论如何仍抱定收复失地之议，而地方局部之接洽，纪文等既已进行，则其无条件而可为物质之大助者，自不妨与之斟酌也。①

一方面反帝，一方面又希望从帝国主义得到援助，这是胡汉民的悲剧，也是近代中国不少爱国人士的悲剧。

对于日方的拉拢和引诱，胡汉民一概采取“推而远之”的应付办法，他曾在一封信中说：

去年以来，矮子之俦，多方求门路，弟皆推而远之，与谈三民主义，与谈日本立国之精神，与言反对军国主义，反对法西斯蒂。②

1935年3月2日，土肥原亲自到香港会见胡汉民，标榜“中日提携”，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，以便日本出兵华北；胡汉民则阐明孙中山的“中日亲善”思想，“实以中日平等为基础”，要求日本改变侵华政策。③土肥原密询日俄交战时，中国孰为左右袒，胡称：“须交还满洲”。福建事变时，陈铭枢等和日本方面有联系，胡汉民告诫亲信说：

福建信使往还，门神乃详知之以为口实，而跛哥等则未食羊肉，先惹一身臊也。故外交无定则，惟视本身利害如何而定，不可遂失政治之立场一也，不可上当如跛哥二也，粤与英密切，不使猜疑而敌视三也。④

胡汉民是个有操守的政治家，他在和日本方面的交往中，确实不

① 胡汉民手迹，未署年月。

② 胡汉民手迹，未署，工，十六日。

③ 胡汉民，《论所谓“中日提携”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5卷3期。

④ 胡汉民手迹，未署，工，十六日。

曾丧失民族立场。

十一 出国与归来

塘沽协定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，“精诚团结，共赴国难”日益成为全国人民，包括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迫切要求。同时，由于形势逼迫和各方推动，蒋介石也在作抗日准备。1935年春，邹鲁向胡汉民建议，改变西南与中央的关系，帮助蒋介石抗日。^①胡汉民接受邹鲁的建议，于6月9日离港赴欧。行前，发表谈话，声称此行目的在于“易地疗养”，“外间传言种种，殊非事实”，“余之主张政策，亦不以时地为转移而有所变易”。^②

在国外期间，胡汉民和国内始终保持密切联系。9月12日，黄季陆致胡汉民函云：

陆定明日启程赴沪一行，目的在对时局有较深之观察，以便应付，同时颇欲乘宁方倒汪失败之后，对宁渐呈离心之势力者必多，能乘时利用，或于吾人之进展不无裨益也。陆之所虑者为宁方对日外交似渐有头绪，若待其成而后反对，不利殊甚。今次所定之计划，惟一目的即在鼓动政潮，明显对立，一面造成汪精卫卖国政权之不稳，同时即所以使其屈辱外交之不易进行也。

当年6月19日，蔡元培在中央政治会议上率先向汪精卫发难，质问其“对日外交究持何策”。吴稚晖、于右任、戴季陶、孙科等继起响应。30日，汪精卫称病休养。7月24日，中央政治会议决定，由孔祥熙代理院务。但是，日本方面随即施加压力，蒋介石

^① 邹鲁：《回顾录》，《邹鲁全集》（二），台湾三民书局版，454页。

^② 《出国谈话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5卷6期。

不得已，只好请汪精卫复职。函中所称“宁方倒汪失败”指此。从此函可以看出，汪精卫复职后，西南方面决定继续斗争，掀起更大的政潮。16日，萧佛成、陈济棠、李宗仁致电国民党中央，旧话重提，要求将1934年9月8日齐电所列“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”等案列入五全大会议题，但南京方面仍然以种种理由加以推拒。其后，西南方面又要求重选代表，并提出：“党的精诚团结，当团结于大会合法进行之下；不当团结于一二人玩弄党权之下；国家之精诚团结，当团结于有效救国方针之下；不当团结于一二人丧权辱国之下。”^①11月1日，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，汪精卫在致开幕词后即遇刺，妥协派遭到一次打击。会议通过了冯玉祥、李烈钧等22人提出的救亡大计案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。

为了打开僵局，蒋介石于11月4日派戴季陶、马超俊飞赴广州，会晤陈济棠、李宗仁、萧佛成等，敦促留粤中委参加五全大会，一面派王宠惠的亲信魏道明赴欧，邀请胡汉民归国，共同主政。戴、马之行大致顺利，魏道明则碰到较多困难。胡汉民态度强硬，不忘旧嫌。他委托程天固与魏会谈，程提出：“倘胡先生在党的地位得到解决，其他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。”又称：“（胡先生）现在主张以抗日救国为唯一主旨，故一切政治措施应以军事之准备为至要，而负此责任者，他早已认定非蒋氏莫属。党与军之责，各有攸关。其他问题，自易商量。我信党军分负责任一点，为蒋胡归好之先决问题，不得不先向蒋氏说明，并须得其同意之确实表示。”^②魏立即致电蒋介石请示，蒋复电赞成。11月15日，五全大会开幕，蒋介石声称：“绝对不订立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，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

① 《西南中央根据齐有两电主张向五全大会从新提出议题之铤、巧、东文四电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6卷5期。

② 《程天固回忆录》，香港龙门书店，1978年版，284—287页。

实。”^①12月7日，五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，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。胡汉民听到这一消息时，“面有悦色”，随即与程天固等草拟改组中枢计划，拟以王宠惠为行政院长，颜惠庆为外交部长。^②

在蒋介石及有关方面的一再电催之下，胡汉民于12月27日自法国启程回国。1936年1月6日，蒋介石派魏道明先期至新加坡迎接。其致胡汉民函云：

尊驾返国，欣感之怀，非言可喻。兹先请伯聪兄专程代表来新迎接，并候长途起居之劳，无任想念。务请即日蒞临京中，共济时艰。佇候之诚，不尽缕缕，伯聪兄必能代致一切也。

1月15日，胡汉民抵港，在书面谈话中要求：“党应恢复为有主义、有精神之党，力除过去灭裂涣散之错误”；“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、有能力之政府，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”。^③25日抵广州，多次发表谈话，批评南京国民政府“对于人民多务压抑，不务领导”。^④他说：“余今日之工作，为如何促进政府之觉悟，并如何团结全国抗战之力量，俾中华民族最后之自救。”^⑤从主张反蒋抗日，推翻南京政府，到主张“促进政府之觉悟”，“团结全国抗战之力量”，反映出胡汉民思想的巨大变化，也曲折地反映出近代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。

5月12日，胡汉民因突发脑溢血于广州逝世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）

① 《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，台湾，第十四卷，381页。

② 《程天固回忆录》287—288页。

③ 《抵港时书面谈话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7卷2期。

④ 《在广东各界欢迎大会中之演说词》，同上。

⑤ 《胡汉民先生对国事之谈话》，1936年2月22日，《胡汉民先生归国后之言论》（二）。